

校编

全唐
诗



湖北人民出版社

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资助出版

校编全唐诗

上

王启兴 主编



湖北人民出版社

鄂新登字 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校编全唐诗/王启兴主编.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1
ISBN 7-216-03008-7

- I. 校…
- II. 王…
- III. 唐诗—选集
- IV. I222.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78321 号

校编全唐诗(上、中、下)		王启兴 主编
出版:	湖北人民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发行:		邮编:430022
照排:	湖北普特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武汉御风图文有限公司	经销:湖北省新华书店
印刷:	武汉市科普教育印刷厂	印张:338.75
开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16	插页:16
版次: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字数:1245 千字
印数:	1—5 000	印次: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7-216-03008-7/I·272	全套定价:780.00 元

主 编	王启兴		
副 主 编	刘鼎华	张 虹	张金海
编 委	(以姓氏笔划为序)		
	马承五	王启兴	王美英
	毛 庆	刘鼎华	汤江浩
	李中华	李尔钢	李作君
	余传棚	张 虹	张金海
	陈顺智	周茂君	徐少舟
	黄正雨	廖源兰	
总 策 划	王建辉	胡光清	李尔钢
	李作君		

责 任 编 辑	李尔钢	李作君
	余欣然	刘 艺
	张 健	

整 体 设 计	汪 汉
---------	-----

电子技术编辑	陈 革
--------	-----

责 任 印 制	杜义平	肖正华
	但汉清	王铁兵

责 任 校 对	和晓玲
---------	-----



我国是一个诗的国度,诗歌的发展源远流长,而唐代诗歌又是我国诗歌发展史上的一座巍巍丰碑。在唐代近三百年的历史时期中,诗人辈出,群星灿烂,涌现出许多在诗歌创作上成就卓越、辉耀千古的大诗人。他们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开拓和耕耘了诗歌园地,使唐代出现了诗歌创作百花竞放、万紫千红、美不胜收、蔚为大观的空前繁荣景象,成为诗歌的盛世。明代的胡应麟对此有所描述:

甚矣,诗之盛于唐也!其体,则三、四、五言,六、七、杂言,乐府、歌行、近体、绝句,靡弗备矣。

其格,则高卑、远近、浓淡、浅深、巨细、精粗、巧拙、强弱,靡弗具矣。其调,则飘逸、浑雄、沉深、博大、绮丽、新奇、猥琐,靡弗诣矣。其人,则帝王、将相、朝士、布衣、童子、妇人、缁流、羽客,靡弗预矣。^①

这一段话,从唐诗的体裁完备,风格多样,诗人众多等方面说明唐代诗坛的繁荣兴盛,是很精到的,胡应麟还未言及唐诗的题材丰富多采,创作天地极为广阔。事实上,在唐代诗人的笔下,从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等重大事件到人民生活、风俗节日、自然景色乃至古木奇花都得到极其生动的艺术表现。唯其如此。唐代诗坛才熠熠生辉,光照千古。



蜚声寰宇的唐诗,又有其发展的历史进程。肇源于杨时,完成于高棅的《唐诗品汇》将唐诗的发展演进分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被称为四唐论。研究者多承其说,似乎已“约定俗成”。但就具体时间的断限而言,则又有差异。高棅以为:“隋氏以还,一变而为初唐,贞观、垂拱之诗是也;再变而为盛唐,开元、天宝之诗是也;三变而为中唐,大历、贞元之诗是也;四变而为晚唐,元和以后之诗是也。”^②徐师曾则说:“至唐而有四等,由高祖武德初至玄宗开元初为初唐,由开元至大历初为盛唐,由大历至宪宗元和末为中唐,由文宗开成初至五季为晚唐。”^③冒春荣之论又有所不同:“初唐自高祖武德元年戊寅岁至玄宗先天元年壬子岁,凡九十五年。盛唐自玄宗开元元年癸丑岁至代宗永泰元年乙巳岁,凡五十三年。中唐自代宗大历元年丙午岁至文宗大和九年乙卯岁,凡七十年。晚唐自文宗开成元年丙

① 胡应麟《诗数》。

② 高棅《唐诗品汇》

③ 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

辰岁至哀帝天祐三年丙寅岁,凡七十一年。”^①迄今为止,还没有形成一个为学术界一致认同的意见。我们认为,结合唐代近三百年社会历史的盛衰,具体历史时期的政局变化,以及由此而影响到诗人的精神面貌、心理状态、审美情趣、艺术追求等方面的变化来考察,同时又虑及一个时代诗歌艺术风貌的变化是一个由渐变到完全呈现新貌的缓慢转变过程,把唐代诗歌的发展分为初、盛、中、晚四唐是可取的。但具体的时间断限仅仅是大致划分的一个时间概念而已,不能过于刻板。另外,五代作为一个独立时期,不应强与晚唐合在一起。

由唐高祖武德元年至唐睿宗景云二年(618—711)为初唐,是唐代诗歌发展的第一个历史时期。唐王朝建立后,作为一代“英主”的唐太宗及其元勋重臣,都十分明确地表示要革除齐、梁的浮靡文风,反对“释实求华,以人从欲”^②的诗歌创作,提倡歌颂太平、赞美寰宇一统的雅正之音,同时也倡导建功立业、匡世济时的积极用世精神。对辞彩宏丽、英华秀发的六朝诗人,也不是一概否定,因而既重抒情,又重文采,这对唐代诗歌的发展无疑有重大影响。至于魏徵在《隋书·文学传序》中所着重标举的合南北文风之所长,以达“文质彬彬,尽善尽美”之境的主张,不唯是一种对南北文学特色的深刻认识,而且也从另一个方面指明了唐代诗歌的发展方向。

正因为贞观君臣在立国之初就提出上述振起一代文风的主张,所以贞观诗坛虽有齐、梁余风,但综观贞观君臣的诗作,已多新气象、新变化、新内容。如唐太宗的《正日临朝》及颜师古、杨师道、岑文本等的奉和之作,极赞天下一统的宏伟功业,力摹太平盛世景象,抒发颂扬功业的情怀。遣词典丽,对仗精工,显示出一种雍容华美的风采。在贞观诗坛上,就是那些饮宴游乐的诗篇,亦或抒平定四海之豪情,或写佐明主而功成的自得,如唐太宗《还陕述怀》、《登三台言志》、《临洛水》,杨师道的《咏马》,虞世南的《门有车马客》等等。这些诗作与齐、梁宫廷诗的轻佻放荡迥然不同。最突出的是唐太宗的《经破薛举战地》、《辽东山夜临秋》,魏徵的《述怀》,长孙无忌的《灞桥待李将军》等篇章,或追怀昔日戎马倥偬的军旅生活,或描摹秋山秋色之壮阔,或抒建功立业之豪情,或直露“人生感意气”的襟怀,有着雄浑劲健、挺拔壮伟的气势与风韵,表现了贞观诗坛变革的新气象。

在贞观诗坛上卓然成家、独立不群的诗人要数王绩,他曾三仕三隐,最后以超然物外的心情、淡泊无欲的人生态度终老东皋。王绩强烈希望回归自然,流连于山林秀色和明净的田野风光之中,因之他的诗篇创造了一种宁静疏淡、淳朴自然的境界,形成率直平易、高古无华的独特风貌,不仅与齐、梁以来诗人迥异,也与贞观君臣之作不同。

高宗时,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等“四杰”登上诗坛,他们以自己的诗歌创作推动唐诗的发展。“四杰”的诗篇多是有感而发,有一种内在的激情,因此写塞漠边关有慷慨昂扬之气,有辽阔壮伟之景;其羁旅赠别篇什,除表达离情别绪外,则常有一种互励互勉的真挚感情,而无哀飒悲凉之意;一些写景之作明快自然;抒发壮志未酬的诗篇,在感叹寂寞的同时,含蕴着积极进取精神。这些都和他们提倡诗歌应有“刚健”之气,批评无“骨气”的浮艳诗风有关。

“四杰”在六朝诗人讲求声律的基础上开拓创造,五言律诗对仗精工,声律和谐,有流转圆润之美。至若卢照邻、骆宾王的七言歌行,格局雄远,铺叙有法,抑扬顿挫,气概充硕,实为初唐健笔。

稍后,陈子昂、杜审言、沈佺期、宋之问等诗人继起。陈子昂激烈批评齐、梁诗“彩丽竞繁”,主张诗歌应回归风雅兴寄传统,大力弘扬“汉魏风骨”^③,并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其理论。他的诗歌现实性很强,有强烈的感受方发而为诗。不论是抨击时弊,指斥朝政,感叹兴亡盛衰,以及抒写建功立业而其志难酬的感喟,还是对人生极富哲理意味的探求,和对江山行旅之思,都发自肺腑,倾泻胸臆,激昂跌宕

① 冒春荣《葑原说诗》

② 李世民《帝京篇·序》。

③ 陈子昂《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

之情充溢其间。诗风遒劲,风骨矫拔,可谓洗尽齐、梁绮靡之习。正如刘克庄所说:“陈拾遗首唱高雅冲淡之音,一扫六代之纤弱,趋于建安、黄初矣!”^①但陈子昂完全否定六朝诗歌的艺术成就,因而其诗质胜于文,气胜于辞,有质朴粗率之弊。

杜审言、宋之问、沈佺期的侍宴应制诗,虽然技巧圆熟,华丽工致,但因是依题和作,无动人的情致。但其被贬谪后的一些诗篇,因有真情实感倾注其间,故而真挚感人。一些纪行诗,以纪实的手法写出,明丽工妙,特征突出。其他篇章,或寓情于景,或触景生情,或直抒怨愁,都有高华严整之致。他们运用五言律诗来写景抒情,已达纯熟自如之境,对唐代五言律诗的定型,实有推进作用。七言律诗体式的确立,杜审言之功亦不可没。胡应麟论初唐律诗云:“初唐无七言律,五言亦未超然。二体之妙,杜审言实为首倡。”^②钱良择则谓:“律诗始于初唐,至沈宋而其格始备。”^③二家所论,不为无见,就七言律诗而言,李峤、宋之问、沈佺期也有出色之作,对七言律诗的定型也有“首倡”之功。

至于五言排律,“四杰”中的骆宾王较为突出,其长达十八韵的《幽縈书情通简知己》,被赞为“精工俪密,极用事之妙”之作^④。李峤、宋之问、沈佺期等也用五言排律来叙写情志,但成就高、影响大则推杜审言。他的五言排律高华庄重,整密精工,其中《和李大夫嗣真奉使存抚河东》长达四十韵,被姚鼐评为:“壮丽精切,实长律佳制”。^⑤五、七言律诗及五言排律等诗歌体式,在初唐时经过不少诗人的创作实践,到李峤、杜审言、宋之问、沈佺期等人手中才完成定型,永为模式。

二

由唐玄宗先天元年至唐代宗永泰二年(712—766)为盛唐,是唐诗发展的第二个历史时期。盛唐是唐代政治、经济、文化空前发展的时代,也是唐诗发展中的第一个高峰。盛唐时期所孕育的“盛唐气象”,是这一时代政治、经济、哲学、美学、文学、艺术等的综观,具体表现则为一种初唐时期所没有的时代精神,那就是:豪迈乐观、激昂慷慨、积极进取、奋发有为,以及强烈的匡时济世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这样的时代是呼唤和产生诗坛巨匠的时代,一大批光彩夺目的诗歌巨星相继升起,这就使盛唐诗坛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

盛唐诗人是在初唐诗人取得多方面成就的基础上,在新的历史氛围中,继续进行创造,已臻风骨、辞彩、声律兼备的“文质彬彬”的完美境界。盛唐前期的诗人如张说、贺知章、张若虚、张旭、包融、王湾、王翰、张九龄等人,他们都是由初唐后期而入盛唐的,所以其诗歌创作对盛唐中期、后期的诗坛影响甚大。张说作为宰辅重臣和一代文宗,既主张“粉饰盛世”,更赞美“天然壮丽”、“逸势标起,奇情新拔”^⑥之作,同时批评“少风骨”、“薄于滋味”^⑦的作品。他的一些庙堂乐章和应制奉和的篇什,是典型的颂美功德和粉饰盛时之作,没有什么价值。至于那些被贬谪外地面对现实和人生而抒情写怀的篇章,则托意深婉,慷慨激荡,别有境界。有的作品如《邺都引》、《幽州新岁作》等,被推为“风神气韵,为盛唐立准”之作^⑧。贺知章的《咏柳》、《回乡偶书》等篇构思新巧,真切感人。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孤篇横绝”,竟为大家。张旭的六首七言绝句,篇篇俱佳,其中《桃花溪》被黄生评为“恬雅秀润,盛唐

① 刘克庄《后村诗话》

② 胡应麟《诗薮》

③ 钱良择《唐音审体》

④ 胡应麟《诗薮》

⑤ 姚鼐《五七言今体诗抄》

⑥ 张说《洛州张司马集序》

⑦ 《旧唐书·杨炯传》

⑧ 周敬等《唐诗选脉会通评林》

高手无以过”(《唐诗摘抄》)。王湾的《次北固山下》，为张说所激赏，竟书其“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一联于政事堂，“每示能文，会为模式”(殷璠《河岳英灵集》)。王翰诸作，寄意遥深，委婉尽致。《凉州词》二首，有“此诗绝妙，无人不知”^①之誉。包融诗成就虽逊于上述诸人，但也有其特色，殷璠称其诗“清幽语奇，颇多剪刻”(《吟窗杂录》引《丹阳集》殷璠评语)。盛唐前期诗人中的张九龄是一位颇为重要的诗人，其诗作除一些应制诗外，多直抒胸中孤愤及叙写入仕后不同时期境况之作。最突出的是采用比兴手法以写怀的《感遇十二首》，含蓄蕴藉，托兴深切，很有“怨而不怒”的风韵。综观张九龄的诗作，以五言古体最佳，可称别树一帜。徐献忠《唐诗品》谓其“体裁疏秀，深综古意，通于远调，上追汉魏而下开盛唐”，并非过誉之论。

开元、天宝年间，也就是盛唐的中期，在“盛唐气象”哺育下的众多诗人先后登上诗坛。他们热情奔放，视野开阔，志趣高远，襟抱宽宏，自信自负，执著追求，在诗歌创作上力图超越前人，表现出一种非凡的创新精神。

孟浩然是这一时期较早出现的自成流派、诗名甚著的隐逸诗人，以其山水田园诗为世所重。他的山水田园诗，景色常因情而发，但又不用浓墨重彩去描摹，而是以疏淡之笔去勾勒，“如画家写意，墨气都无”^②，其景物不论山水林石，草木园圃，烟霭雾露，朝阳清晖，抑或古刹幽壑，扁舟清溪，夏荷秋菊，渔人牧童，都以淡墨点染，充溢着一种天然清旷、超俗远神的韵致和艺术风貌。就诗歌的韵味观之，已达“语淡而味终不薄”(沈德潜《唐诗别裁集》)之境，故为盛唐名家。

与孟浩然齐名的王维，是盛唐时期以山水田园诗而负盛名的又一家。王维是虔诚的佛教徒，虽为官而乐居山林，因而亦官亦隐以终。他的诗歌成就是多方面的，但最突出也是历来最为人们所称赏的还是山水田园诗。其山水诗最显著的特色是描写出一种幽深空寂的境界。如《辋川集》二十首中的《鹿柴》、《竹里馆》、《辛夷坞》和《皇甫岳云溪杂题五首》中的《鸟鸣涧》等等，既写出山林幽静深旷之景，又着力表现一种充溢着禅意的空寂之境，其高妙处在于写空寂之山林不从无声无色处着笔，偏从有声有色处展示，愈见其空，愈见其寂。这些诗篇都有高远空谈、自然明净的优美意境。其田园诗则不刻意雕绘，而田野景色依然，田家农事如绘，意兴闲远，韵味隽永。王维还以画家的眼光去观察自然景物，以画法为诗，因之其布局结构，色彩敷设，景物描摹，无不合度中矩，诗情浓郁，极富画意，即苏轼所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东坡题跋·书摩诘蓝田烟雨图》)亦如王鏊所云：“辋川诸诗，直是一片水墨不着色画。”(《震泽长语》)

盛唐时期除孟浩然、王维而外，还有储光羲、裴迪、常建、綦毋潜、丘为等诗人，都有田园山水之作，也各有所长。储光羲是盛唐时写田园生活较多的诗人，如《樵父词》、《牧童词》、《采莲词》、《田家杂兴八首》、《同王十三维偶然作十首》等等。储光羲笔下的老农、樵人、牧童都带有隐者气息，他们都“腹中无一物”，无尔虞我诈，忘机巧竞争，淳朴天真，生活是那么闲适自在，悠然惬意，很有返朴归真的况味，“此种真朴，右丞田家诗中未能道者”(沈德潜《唐诗别裁集》)。裴迪的山水田园诗，多为与王维酬唱之作，有的篇章虽幽淡而有情致，但终难与王维比肩。常建诗亦有清幽超妙之处，如《题破山寺后禅院》、《西山》等。綦毋潜多游古寺道观题咏作品，虽有清幽之境，但谈禅证道之语甚多，未达妙境。其他如崔国辅则以极富江南民歌风味的乐府短章擅绝一时；张子容诗虽有略似孟浩然者，但情浅味薄，终逊于孟。

被称为“诗家夫子”的王昌龄，其诗除抒写怀抱之作外，以赠别、宫怨、闺情、边塞等篇章独秀于时。赠别诗如《芙蓉楼送辛渐二首》等，借送友以自抒胸臆，委曲尽致，别具风神；宫怨诗如《长信秋词五首》等，命意新颖，措词考究，优柔婉丽，含蕴无穷；闺情如《青楼怨》、《闺怨》等，感时恨别，凄苦忧伤，情思

① 徐增《而庵说唐诗》

② 叶燮《原诗》

浑含,是为绝唱;边塞诗如《塞下曲四首》、《从军行七首》等,意态雄健,壮逸浑成,可称盛唐时边塞名篇。

诗篇“传乎乐章,布在人口”^①的王之涣,虽然仅存诗六首,但情致雅畅,风韵超绝,千古传颂。崔颢以《黄鹤楼》一诗脍炙人口。其取调南朝乐府的《长干曲》,清新自然,远胜前人;五首写边塞的篇章,雄劲流利,亦复可观。李颀诗首推送别寄赠一类,描写被送者的精神风貌、个性特征,历历如绘,跃然纸上,神韵悠然,为盛唐时独树一帜的篇章。其次为边塞诗,慷慨激扬,骨气老劲,高步盛唐。再次为几首描写音乐的诗作,既写出诗人的真切感受,又浮想联翩,描摹生动,曲尽情态,在盛唐亦为不可多得者。在诗体的运用上,李颀以歌行和七言律诗见长,音调浏亮,意兴超迈,独具神采。

“喜言王霸大略,务功名,尚节义”^②的高适,壮心落落,豪气纵横,其诗“多胸臆语,兼有气骨”^③。纵观高适的诗歌,即使是那些酬答赠别之作,其经世济时的怀抱,建功立业的追求,或矢志不平的苦闷,都从内心喷发而出,激宕感慨,苍莽浑厚,有一种感人的艺术力量。而饱含金戈铁马之声、塞漠雄阔之气的边塞诗,则是高适亲身体察有所感和有所思的盛唐佳作。《燕歌行》、《蓟门五首》、《使青夷军入居庸三首》、《自蓟北归》等诗,既有对当时守边之策不当的抨击,又有雄才难展,沉于下僚的愤慨,更有希望边境安宁和平的美好意愿。至于《送李侍御赴安西》、《登垒》、《金城北楼》、《营州歌》、《九曲词三首》、《塞下曲》等等,则着重抒发“功名万里外”的豪情,赞颂边将的勋业,也不乏对塞垣景物的描绘,这些更凸现其激昂慷慨、矫健雄奇的风韵。因高适诗有独特的艺术个性,所以有“慷慨悲壮,气骨风度绝然建一代旗鼓者”(周敬等《唐诗选脉会通评林》)的赞誉。

与高适齐名的岑参,也是一位积极用世,乐观向上,强烈希望建功立业,报效国家的诗人。他除了为地方州郡官外,还有“累佐戎幕,往来鞍马烽尘间十余载,极征行离别之情,城障塞堡,无不经行”(辛文房《唐才子传》)的经历,因而他对边情有更深的了解,对大漠戈壁的奇异风光有更细的观察,加以卓越的艺术表现才能,使其边塞诗“自成一家”。被杜甫称为“好奇”的岑参,在盛唐诗人中第一次以大量的作品生动地表现西北边塞奇异景物,风土人情,边地战争,军旅生活,以及从军边疆士人的精神风貌。诗篇雄奇壮丽,昂扬奔放,峻拔宕荡,风骨浑劲,而诗人的襟抱情志也熔铸其间。当然,边塞诗是岑参开拓创新之作,千古传颂,甚至被赞为“非子美、达夫所及”(毛先舒《诗辨坻》)。岑参的一些送别寄赠篇什,也都情真意切,摹描惜别之怀,宛然在目。其他的不少景物诗,鲜秀清丽,诗境高雅不群,在盛唐人中也是突出的。

此外,被殷璠评为“气虽不高,调颇凌俗”(《河岳英灵集》)的祖咏,“既多兴象,复备风骨”(同上)的陶翰,“为人骨鲠,有气魄,其文亦尔”(同上)的薛据,“诗鲜净有规矩”(同上)的李崱,“诗多叹词要妙,清意悲凉”(同上)的崔曙,“其警策语多真素”(同上)的阎防,“情幽兴远,思苦语奇”(同上)的刘方平等诗人,都各有所成,也是盛唐名家。

李白是在“盛唐气象”哺育下登上诗坛的伟大诗人,也是盛唐诗人的杰出代表。他有着“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的远大抱负和“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同上)的政治理想以及“不求小官,以当世之务自负”(刘全白《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的追求;更有“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的傲岸性格和“大鹏一日从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上李邕》)的对自由的热爱;还有“一生好入名山游”(《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的生活情趣。这些都有着鲜明的时代印记。

在诗歌创作上,李白以敏锐的眼光观察社会,以饱满的热情关注朝政和国家的命运,所以不少诗

① 靳能《唐故文安郡文安县太原王府君墓志铭并序》

② 《旧唐书·高适传》

③ 殷璠《河岳英灵集》

篇反映社会的生活面也很宽广,如批判权奸把持朝政,指斥帝王及贵族的荒淫,揭露是非颠倒,贤愚不分等,在盛唐中期的诗人中是很突出的。李白是一个“肺腑见情愫”的诗人,他的不少抒情言志之作,不论是对建立勋业的执著追求,还是对功成身退而遨游江湖的真诚表露,抑或是不屈己于人、不摧眉折腰的傲然独立之情的倾吐,以及向往自由和对传统束缚身心的礼法的抗争,都表现出其豪迈不羁,热情奔放,超旷飘逸的精神风貌,这可以说是盛唐中期诗坛上的一种新境界。他的景物诗,则多是大笔挥洒,兀突雄奇,壮伟俊逸,色彩瑰丽,气势非凡。有的篇章笼罩着某种神话气氛,更显得窈冥惝恍,纵横变幻,光怪陆离,有着震撼人心的艺术效果。这与同时代诗人的山水景物诗又是迥然不同的。在艺术表现上,李白好奇思幻想,即所谓驱走风云,鞭挞海石,招遣神怪,变幻恍惚,“实与屈子相映照”(许学夷《诗源辨体》)。同时他极力运用夸张手法,但自然而不怪诞,有一种奇险壮逸之美。此外,李白还有一些诗篇明朗清秀,如王安石所说:“诗人各有所得,‘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此李白所得也。”(《苕溪渔隐丛话》引)在诗体方面,除七律外,李白各体均擅,尤其是五七言古体和五七言绝句为历代诗论家所称道,这也是李白对唐诗发展的贡献。

在盛唐后期的诗坛上,还有一颗光芒万丈,照耀千古的巨星——杜甫,他和李白被称为唐代诗人中的“双子星座”。由开元盛世经安史之乱而进入大转折时期的杜甫,以他那如椽的诗笔广阔、真实、深刻地反映了这大动乱的社会生活,使其诗篇成为最生动的历史画卷,这在盛唐诗人乃至唐代诗人中都是无与伦比的。唯其如此,这些不朽诗篇在唐代就被赞为“诗史”,这是由唐迄今不可动摇的崇高赞誉。

出身于“奉儒守官”之家的杜甫,政治理想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像帝舜时的贤臣稷和契一样辅佐国君是其抱负;天下太平,人民安居乐业是他美好的愿望;政治清明,无勒索欺压人民的贪官贪吏,是他的期盼;贞观盛世重现,“煌煌太宗业”的复兴,是他的追求;“穷年忧黎元”,是他一生执著不易的情怀。在盛唐诗人中,杜甫是一位有着强烈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的诗人。

杜甫是集大成的伟大诗人,诗篇“浑涵汪茫,千汇万状”(《新唐书·杜甫传赞》),在盛唐诗人中有着异于他人的显著特色。杜甫一生始终关注国家的命运和人民的苦难,并自觉地与其联系在一起。因此,那些有关朝政、战争、时局、人民疾苦的诗篇,其深度和广度都是空前的,其感人的艺术力量也是光掩前人而后来难继的。杜甫不仅深切关注国家和人民的命运,而且对妻室儿女,友朋亲故,鸡虫花鸟,自然风物都有着真挚深厚的感情,诗篇都是因情立意,因情遣词,因情敷句,因情起结,这也是凌轹千古的。其咏物之作,除寄寓深沉的感慨和襟抱之外,更极传神写照之能事。题画诗篇,下笔有神,描摹精妙,画境在目,使人神游象外。景物诗,诗味醇,画意浓,沁人心脾。杜甫深微的观察,细致的审美,超凡的描写,实乃冠绝古今。至于其沉郁顿挫的艺术风格,精于诗律的娴熟诗艺,也是独出于时的。

与杜甫同时的元结,也是一个以天下安危为己任并有着经邦济世之才的仁人志士。他不仅受命招抚唐、邓等州的义军,而且坚守泌阳,阻止史思明叛军的侵扰,保全了十五座城池;同时深察民瘼,为减轻人民繁重的赋税而抗争。元结从儒家的传统文学观出发,认为诗歌的职能是救时劝俗,“极帝王理乱之道,系古人规讽之流”(《二风诗论》)。他的《二风诗》、《系乐府》、《舂陵行》、《贼退示官吏》等诗,就是实践其文学主张以讽谕世风,裨补时政的。因此,反映人民疾苦,反对急征暴敛,就成为元结诗歌创作的自觉追求。元结诗高古朴素,简明平淡,在盛唐诗人中别是一路。

盛唐后期为元结所推重的沈千运、王季友、于逖、孟云卿、张彪、赵徵明、元季川等人,虽然经历过开元、天宝盛世,但因仕途失意,蹭蹬坎坷,又因战乱,四方游徙,生活贫困,所以诗歌都以个人的真实感受为基础而抒情写怀。这一诗人群体的作品大多散佚,从现存的四十余首诗来看,既没有盛唐诗人远大的抱负,乐观昂扬的情怀,也没有积极用世的理想和执著追求,一派愁苦哀伤之情、衰飒沉郁之境,所以“在盛唐自是别调,亦非诸大家、名家之比”(刘大勤辑《师友诗续录》)。

三

由唐代宗大历元年至唐穆宗长庆四年(766—824),是唐诗发展第二高峰,即中唐时期。大历年间,高适、杜甫、岑参、元结等诗坛耆宿相继谢世,活跃在诗坛上的是:长安、洛阳的“大历十才子”;于江南“窃占青山白云,春风芳草”(皎然《诗式》)的刘长卿、韦应物、戴叔伦、李嘉祐、顾况、张继、戎昱;诗僧皎然、灵一、灵澈、清江、大易;隐逸之士秦系、朱放、张志和、陆羽、章八元等。他们的经历不同,所处的社会环境也各异,诗僧更有其宗教信仰,所以诗风及成就也有别。

韦应物是由盛唐后期而入中唐的重要诗人。他早年宿卫仗内,加之性格豪爽仗义,所以一些诗篇尚有盛唐余韵。有的篇章反映人民疾苦,有自愧之情;有的诗则感叹盛世已过,往事如梦。就韦应物诗歌的主要创作倾向而言,白居易评为“高雅闲淡,自成一家之体。”(《与元九书》)司空图则云:“趣味澄复,若清沈之贯达。”(《与王驾评诗书》)这种平淡闲远、萧散恬适的艺术特色,不少诗论家都认为源自陶渊明。韦应物确有多首效陶体的作品,但他“立性高洁,鲜食寡欲,所至焚香扫地而坐”(李肇《国史补》),因之诗中孤寂落寞之情甚浓,方外超俗之思亦厚。

刘长卿也是由盛唐后期入中唐的重要诗人。早年因功名无成,生活困顿,多有嗟叹不遇、感慨不平的诗作。《从军六首》、《疲兵篇》等边塞诗,凝炼深沉,气健格高,很有盛唐风韵。安史之乱后,虽为官而沉于下僚,又因刚而犯上,屡遭迁谪,诗篇虽有感时伤乱、忧国悯民之音,但更多的是哀婉凄恻,冷落寂寥,或悠然自适的作品,表现出一种清淡闲雅、流畅浑然的韵味。刘长卿擅长五言,尤工五律,自许为“五言长城”,殆非虚语。

其他如戴叔伦虽有少数篇章反映战乱中人民苦难,但其诗多抒写黯然伤怀的离情别绪,或羁旅行役的忧愁愁思,还有归隐林泉的出世之情,盛唐风韵已荡然无存。高仲武《中兴间气集》评其诗“骨稍软”是有见地的。李嘉祐久宦吴中,其诗既有山水田野清丽景物的描绘,也有吴越战乱残破景象的勾画,更多的是在送别酬答中点染江南风光。高仲武从其诗风清远自然着眼,认为“与钱、郎别为一体,往往涉于齐、梁,绮靡婉丽”(《中兴间气集》),甚确。顾况则力倡风雅及乐府优良传统,有《上古之什补亡训传十三章》及《江村乱后》等反映现实和讽喻之作,对白居易、元稹等人的新乐府创作很有影响。同时顾况还有不少表现归隐山林以自适的诗篇,清浅明快。张继诗适意写心,丰姿清迥,洗练纯净,已非盛唐之韵,其《枫桥夜泊》,则脍炙人口。戎昱诗多有继盛唐诗人关心现实,反映战乱及民生疾苦,忧时报国的篇章。至于《塞下曲》、《从军行》、《塞上曲》、《赋得铁马鞭》等等,慷慨激越,风力远扬,尚有盛唐音调。此外,像严维、张南史、柳中庸等,从诗篇总体上看成就不高,仅一二首为人称赏。

中唐诗人姚合新编《极玄集》卷上“李端”条下云,李端与“卢纶、吉中孚、韩翃、钱起、司空曙、苗发、崔峒、耿伟、夏侯审唱和,号十才子”。他们都生长在安史之乱前,大都在天宝时或安史之乱后登第,以长安、洛阳为活动中心,活跃在大历诗坛上,但他们大多依附于豪门显宦,“不能自远权势”(胡震亨《唐音癸签》)。所以就其胸襟怀抱而言,既乏盛唐诗人匡世济时的壮志,也无面对现实、关心人民困苦的情怀,更无傲视王侯权贵的肝胆,以平庸的思想境界发而为诗,自然不可能有气势健举、格调高逸、豪壮慷慨之作。他们有少数诗篇反映战乱生活,如李端的《宿石涧店闻妇人哭》、耿伟的《路旁老人》、《宋中》、卢纶的《逢病军人》、司空曙的《贼平后送人北归》等等,这是他们的作品中最有光彩的篇章。“十才子”除韩翃、吉中孚分别官至户部侍郎和中书舍人外,其他如钱起终考功郎中,司空曙入韦皋幕,李端终杭州司马,耿伟官左拾遗,卢纶仅为检校户部郎中。仕途不达,官卑位低,这样在他们的作品中就有嗟卑伤贫的诗篇,如耿伟的《酬李文》,卢纶的《郊居对雨寄赵诣给事包佶郎中》、司空曙的《逢江客问南中故人因以诗寄》等等。“十才子”虽经安史之乱,但他们没有把自己和国家人民的情感相连,只是以旁观者的眼光去看大乱之后的现实,在诗篇中冷静地加以表现,如华清宫的残破久闭,长安周围畿

县的荒凉破败,以及满面愁容的农民等等。诗中无强烈的感慨,无深切的同情,情调十分低沉。“十才子”既流连于长安、洛阳,他们互相酬唱,名动一时。所以王侯权要之家的宴集他们总是坐上之客,主动地即席赋诗,或推崇权贵盛德,或歌颂朝廷中兴,或粉饰升平。此外,如钱送宰相或重臣出镇的送别诗,则纯属应酬之作,钱起、李端等人尤为突出。“十才子”的大量作品,追求一种清雅闲淡的境界,充溢浓厚的寂寞萧索的情思,这在李端、司空曙、钱起、卢纶等人的一些诗篇中最为明显。“十才子”中,除仅存诗一、二首的吉中孚、夏侯审、苗发外,其他人的景物诗也还有清秀幽远之作,以细致的描写见长。大历时期是唐代社会一大转折的时期,也是诗歌发展一大转折的时期,与盛唐诗坛相较,确是“气骨顿衰”(胡应麟《诗薮》)、“开、宝浑厚之气,渐远渐漓”(《四库全书·〈钱仲文集〉提要》)。

大历时的江南还有一个诗名远播的诗僧群体,这在刘禹锡的《澈上人文集记》中表述得很清楚:“世之言诗僧多出江左,灵一导其源,护国袭之,清江扬其波,法振沿之。……独吴兴昼公,能备众体,澈公承之。”在这些诗僧中,灵一最长,创作活动也较早,确有“导其源”的作用和影响。从灵一现存的四十余首诗来看,多为与同道者酬答赠别之作。虽然灵一“持律甚严,以清高为世所推”(陆时雍《唐诗镜》),但在这类诗篇中无参禅证道的说教,也少不食人间烟火的绝俗情思,而是充溢着深挚的情谊,世俗化的倾向很浓重。一些描写自然景物的诗篇,以描摹精微、刻画入神为世所称。灵澈也多酬赠篇什,未能远俗,其写景诗则多警句。清江、法振等人,亦多与当时诗人交游,颇多世俗情怀。这一时期最负盛名的诗僧当推今存诗四百八十余篇的皎然,不唯为大历诗僧之冠,其诗之影响在中唐亦仅次于刘长卿、韦应物。皎然作为大历时期有名的诗僧,与不少诗人、名士、隐者、释徒、羽客都有交谊,因而其诗歌世俗化的倾向更浓,酬唱寄赠之什已是感怀多情,更有《昭君怨》、《长门怨》、《铜雀妓》、《答李季兰》等一系列女性题材的篇章,愈显其无清静之心,无寂灭之性。当然,皎然毕竟是一禅僧,也有不少表现“淡心即是道”的禅理以及借自然景物写禅趣的诗篇,其特色也是比较鲜明的。

大历时隐逸诗人最著名者有秦系、于鹄、陆羽、朱放、朱湾、张志和等,秦系夙慕林泉,心怀丘壑,除酬和之作外,题禅僧、道者所居之诗,幽静闲远;写隐居山林之作,清新婉隽,颇有闲谈之趣。于鹄归隐汉阳,其诗多世外之思,高人之意。朱放之诗,“能以烟霞风景,补缀藻绣,符于自然”(顾况《右拾遗吴郡朱君集序》)。朱湾放情江湖,“诗体幽远,兴用洪深,因词写意,穷理尽性,于咏物尤工。”(《中兴间气集》)张志和流传的作品虽不多,而其《渔父》借渔父以自写照,表现出一种世外高人的风采。

在大历至贞元的诗坛上,李益五在兵间而诗名早著,“往往鞍马间为文,横槊赋诗,故多抑扬激厉悲离之作”(《唐才子传》),是七绝足称独步的名家。李益诗虽有酬赠、咏怀、闺情、边塞等题材,但其边塞诗有突出成就,为他人所不及,其主要特点是比同时代诗人较多慷慨之气,壮阔之境。著名的如《塞下曲》、《度破讷沙二首》、《暮过回乐烽》等,抒写征人立功报国、杀敌卫边的豪壮情怀;《观骑射》、《暖川》、《塞下曲四首》之一、《盐州过胡儿饮马泉》等,则写出军中日常生活与边地风光,辽廓广远;《赴邠宁留别》、《再赴渭北使府留别》、《从军北征》、《拂云堆》等等,则摭写诗人从军情怀,很有壮怀激烈的况味。李益存七绝五十余首,情味隽永,加之韵律和谐高亮,历来诗论家赞誉有加。如胡应麟云:“七言绝,开元以下,似当以李益为第一。”(《诗薮》)虽有溢美之处,但也说明李益七绝的成就。

由贞元至长庆年间,朝野渴望中兴,于是政治改革思潮相继出现,加之某些弊政的革除,淮西叛乱的平定,确有些“中兴气象”,唐诗发展的第二个高峰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这一时期的诗坛上的显著特点是:有多种流派,诗人艺术个性鲜明,有很强的独创性,风格各别。

明代的谭元春说:“诗家变化,自盛唐诸家而妙已极,后来人又欲别寻出路,自不能无东野、长吉一派。”①孟郊、李贺等“别寻出路”,就是在诗歌创作上另辟蹊径,开拓创新,独自成家,以超越前人。在中唐诗坛上,属于孟郊、李贺一派的诗人,尚有韩愈、卢仝、马异、刘叉、贾岛等人。他们崇怪尚奇,争险

① 钟惺、谭元春《唐诗归》

斗僻,诗歌艰涩古奥,光怪陆离,而且刻意为诗,字句沉着。孟郊长于五言,尤专古体,追求硬语盘空,不务平淡轻熟,刻意搜奇斗险,力避俗套庸弱,形成清奇僻古、枯涩险奥的独特艺术风格,创造出一种清峭高奇之美的诗歌境界,对这一诗派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孟郊的诗除少数篇章触及社会现实和人民的饥寒外,大多为抒写仕途失意,世路艰险,生活困顿,叹老嗟贫,以及情亲悲欢之作。一些写自然景物的诗篇,也是把主观情感倾注其间,表现出险奇深幽、寒瘦萧索的诗境。

韩愈是尚奇险、求光怪这一派的重要诗人,也是中唐对后世有影响的诗人。就诗歌的思想境界而论,比孟郊深刻阔大,在艺术上更着意于雄奇险峭、光怪陆离诗美的创造,成为中唐诗坛上“一大变”的主要诗人。韩愈的诗歌内容丰富,有抨击朝廷弊政,反映人民在兵连祸结环境中苦难的诗作,有否定神仙之说,批判佛教大盛给国家社会造成极大危害的篇什,有指斥藩镇割据,维护国家统一的作品,有揭露宦官专权,朝政日非的篇章,有描写壮丽河山及自然景物的诗章,有充满真挚情谊的赠友送别名篇等。韩愈诗众体兼备,但以长篇巨制及短小绝句最为出色。韩愈不屑趋时,刻意独创,其诗“文体多,而造境造言,精神兀傲,气韵沉酣,笔势驰骤,波澜老成,意象旷达,句字奇警,独步千古”(方东树《昭昧詹言》)。

李贺也是尚奇一派的重要诗人。在诗歌创作上摘裂险绝,刻峭独出,在中唐诗坛上有“开创千古不经见之面目”(钱良铎《唐音审体》)之誉。李贺才华横溢,但以家讳而不能应进士试,仅得一从九品上的奉礼郎小官,因此抑郁以终。李贺的诗歌除几首正面触及当时社会现实,以及抒发个人怀才不遇的情怀外,描写神仙鬼怪世界的作品不唯数量多,而且艺术上戛戛独造,成就突出,也最有特色。这类诗歌不论是七言歌行、五言古体,或是五、七言近体,都在创造一种虚幻荒诞、瑰奇诡怪、五色炫耀、变幻莫测的艺术意境。其源虽始于《楚辞》,但因其驰思高玄,超出时径,驱遣自如,变幻莫测,故自成家。与韩愈相较,李贺追求的是一种凄艳幽奇、诡幻斑斓、缥缈恍惚的诗美。

这一派的其他诗人还有卢仝尚奇僻,好怪异,其诗脱略拘束,放笔挥洒,险怪百出;刘叉诗极其变怪,又运以时事,自成格调;贾岛则寒瘦僻涩,亦能名世。至于马异,流传诗作不多,其诗风与卢仝等人近似,这里不逐一缕述。

在中唐诗坛上还有一个以乐府来反映现实,把诗歌写得通俗明白、浅近易读的诗派,这就是王建、张籍、白居易、元稹、李绅等人。他们不仅在乐府诗中如此,就是在近体诗中也追求清浅明快的诗美,这是一种创造,也是诗坛一种变新的表现。王建是在贞元年间就自觉地在诗歌创作中表现一种平易通俗、自然畅晓的艺术风格,像《原上新居十三首》、《新嫁娘词三首》、《荒园》等等,虽写日常生活小事,但生活气息浓,不作丽语,朴素生动,有民歌之趣。其众多的古题乐府和新题乐府,都以深切时事、寓意婉曲见长,特别是新题乐府,因事立题,摆脱拘束,着眼现实,淡淡写来,以俚语成章,讽谕深刻,抨击有力,著名者如妙特前古的《宫词一百首》。至于“征戍迁谪,行旅离别,幽居苦况之作,俱能感动神思,道人所不能道”(《唐才子传》)。

张籍与王建是知友,在诗歌创作上也是同道。“学诗为众体”这是张籍的自道。他确在各种体裁上都有一定成就,近体诗不论五言律诗、七言律诗或五、七言绝句都有佳作,张洎《项斯集序》云:“元和中,张水部为格律诗,尤工于匠物,字清意远,不法旧体,天下莫能窥其奥。”所评虽有过誉之嫌,但也说明张籍律诗并非“无足观者”。张籍的诗作最杰出的当推乐府诗,他和王建一样继承了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以及杜甫“善陈时事”的优良传统,广泛而深刻地反映当前的现实。张籍的古题乐府在艺术成就上,有稍逊于新题乐府之处,但在反映战乱、征戍、徭役等给人民带来的沉重灾难方面则同样是语意俱深的。其新题乐府,数量虽不及古题乐府多,但可以说是篇篇出色,如《樵客吟》、《江村行》、《野老歌》、《贾客乐》、《牧童词》等等,感情深挚,描写动人,表现出深婉沉着、流畅清迥、一唱三叹的韵致。高棅对张籍的乐府诗有确切的评价:“或旧曲新声,或新题古义,词旨通畅,悲欢穷泰,慨然有古歌谣之遗风,皆名为乐府。虽未必尽被于弦歌,是亦诗人引古以讽之义欤?抑亦唐世流风之变而得其正

也欤?”(《唐诗品汇》)总之,张籍和王建诗歌的平易质实,明快畅达,意深旨远,是中唐诗坛上“变新”的明显标志。

中唐诗坛上的白居易是一位在唐诗发展中颇为重要的诗人,也是诗歌创作很丰富的诗人。白居易生前对自己的诗文进行多次整理、编辑,并缮写分藏各处,所以他的近三千首诗能流传至今。诗人自己将这众多的诗篇分为讽喻诗、闲适诗、感伤诗、杂律诗四大类,前三类是就诗的内容而言,后一类是就诗的形式着眼。在这四类诗中,诗人最看重也为后人所称道的是讽喻诗。现存的一百七十余首讽喻诗,是诗人“以诗补察时政”(《与元九书》)的产物,是“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新乐府序》),政治意图十分明确。讽喻诗所抨击和揭露的社会问题是很广泛的,反映民间疾苦,指斥统治者横征暴敛、荒淫奢侈是其主要内容,也还有反对穷兵黩武和各种弊政,以及为妇女的不幸而呼吁的。总之,对当时社会上种种弊端,诗人都毫不留情地加以暴露。讽喻诗主题明确,批判有力,叙事生动,评议激切,语言通俗,成为其显著艺术特色。

感伤诗中的《长恨歌》和《琵琶行》,是两篇脍炙人口的叙事长诗,千百年来广泛传诵。前者以唐明皇和杨玉环的爱情故事为题材,贯注“长恨”主旨。后者为诗人被贬江州司马时所作,因送客浔阳江畔闻琵琶而增感慨。两诗叙事曲折尽致,波澜起伏,三回九转,情文相生,真切动人。黄周星评此二诗云:“乐天之妙,妙在全不用才学,一味以本色真切出之,所以感人最深。”(《唐诗快》)十分中肯。讽喻诗以外的三类诗,就诗歌的思想内容来看,有不少是在仕途中受挫折或遭打击之后,感叹人生无常,宣扬及时行乐,有的则大谈佛教寂灭和老庄无为思想,艺术上也显得千篇一律。另一部分则是诗人感受深、构思精、艺术表现也很有特色的力作,其内容有抒写社会生活中的真实感受,朋友之间的真挚情谊,以及咏物、闺怨、留题、描摹自然风光等等,这些诗或长篇、或律体、或绝句,俱挥洒自如,情到语流,自然浑成,清新明朗,于平淡处见新,于浅俚处见醇,于真朴处见深,这是他人所不能到处。所以胡应麟《题白乐天集》云:“唐诗文至乐天,自别是一番境界,一种风流。”此评正说明白居易在唐代诗歌发展中的地位。

与白居易齐名的元稹,也是新乐府的倡导者。从他现存的八百多首诗来看,以“专以道得人心事为工”(张戒《岁寒堂诗话》)的乐府诗为佳。这些“刺美见事”的作品,触及的社会问题也较广泛,如贪官污吏的横暴,黎民百姓的苦难,豪门权贵的淫乐无度,人民不堪压迫的哀号等等,诗风平浅通俗,有“言浅而思深,意微而词显”(薛雪《一瓢诗话》)的显著特点,其他篇章也多从个人的生活实感而发,或写世路艰难,或抒不满现实的愤懑,或表友朋间之情谊,或叙男女间艳情。其中尤以悼亡诗为世所称。

李绅也是与白居易、元稹同倡新乐府的重要诗人。他的《新题乐府》二十首虽佚,但从元稹所和十二首可以看出,都是“因事立题”,“雅有所谓”而作,现实性和功利性都很强。《悯农二首》则是由仁爱中写出的名作,古朴自然,含意深邃,千百年家传户诵,童叟均知。李绅晚年自编《追昔游诗》三卷,记其生平及游历,多感时伤逝、惆怅追怀的情思,一些模山范水之诗,写景物亦有静观之妙,但也有谈禅说教之弊。诗风平易浅切,则与白居易、元稹之作相类。

在中唐诗坛上还有不属于孟郊、韩愈和白居易、元稹两大派,而又各有成就,诗风迥异的诗人,如刘禹锡、柳宗元、姚合等人。

被白居易称为“诗豪”的刘禹锡,在中唐是“无体不备,蔚为大家”(管世铭《读雪山房唐诗序例》)的重要诗人。从其现存的七百多首诗看,不仅内容丰富多彩,而且艺术表现上也独具特色。刘禹锡在诗歌创作中深受传统的美刺比兴说的影响,同时以自己广博的历史知识用于诗歌创作,又善于学习民歌之长,因而其诗歌自是深广而不同凡响。他广泛接触到当时劳动人民多方面的劳动生活,如畲田、插秧、采菱、狩猎等等,真实地描写,颂美之情含蕴其中。其次是用比兴手法讽刺当权者的丑恶与腐朽,其旨隐而意深,精警高妙。再次则以史为鉴,用怀古、咏史来借古讽今。这些诗篇概括力强,感慨深

沉,发人深思。第四是抒发非罪谪迁之情及感叹时事,语意最深,情感激切。最后还有模仿民歌而创作的清新活泼的竹枝词、杨柳枝词,清新流利,词意高妙,所谓“乐府小章,优于大篇”,诚为确论。刘禹锡的诗歌在中唐乃至唐代都颇具特色,这就是不少诗篇流利婉转,自然畅达,同时“骨力豪劲”,有一种清刚的风韵,此其一。其二,有思想家所特有的敏锐眼光和洞察力表露出的警拔精深,极富哲理意味。其三,《竹枝词》诸作,“所写皆儿女子口语,然颇有雅味”(毛先舒《诗辩诂》),已达叙风情而不俚,追往昔而创新之境,故足以动心悦耳,自成绝调。

柳宗元的诗作现存仅一百六十余篇,量少而质高,在中唐诗坛上,也是于韩、孟和元、白两大诗派之外卓然成家的诗人。柳宗元的诗大多作于贬谪之后,因远贬遐荒,怨愤难平,所以多数篇章都是借登山临水以抒写离乡去国,身居蛮荒,形同拘囚的悲哀与愤懑。这些诗歌不论是古体近体,抑或短章绝句,俱有因景起情、情以景发、情景相生、妙合无垠的艺术境界,形成了凄怨悲恻也就是方回所说的“哀而酸楚”(《瀛奎律髓》)的诗风。当然柳诗还有苏轼所评的“发纤秣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书黄子思诗集后》)的一面。正因为柳宗元诗有其突出成就,历代不乏中肯的评价。如贺裳云:“大历以还,诗多崇尚自然。柳子厚始一振厉,篇琢句锤,起颓靡而荡秽浊,出入《骚》、《雅》,无一字轻率。”(《载酒园诗话又编》)

宋代“四灵”派所崇奉的姚合,在中唐与贾岛齐名,世号“姚贾”。姚合虽然与贾岛为诗友,但与贾岛孤峭僻涩的诗风有异,即平淡自然。姚合一生爱好诗、酒、花、竹、琴、鹤等,又多与僧徒羽客交往,表现出一种自适闲放的个性。早年数为下邑县尉,所以“官况萧条,山县荒凉,风景凋弊之间,最工模写”(《唐才子传》),这方面五言律诗《武功县中作三十首》为其代表作。以后仕途虽达,但姚合趣终不改,仍沉于诗酒,赏花种竹,庄园遨游。总之,姚合这些赏春、闲居、题庄园、游山寺及酬赠之作,不论古体、近体,都力避前人蹊径,有所创造,但以其“刻画太甚,流于纤仄者,亦复不少”(《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至于篇中佳句,多有耐人寻味者。

中唐时期,还有几个女诗人的诗歌创作值得注意。长期生活在越中的李冶,与刘长卿、陆羽、朱放、皎然均有交游,并有诗酬唱。刘长卿颇赏其诗才,“谓季兰为女中诗豪”。(《唐诗纪事》)高仲武《中兴间气集》卷下选录其诗六首,有“自鲍昭以下,罕有其伦”的赞誉。从李冶现存的十六首诗来看,多寄赠送别之作,也有闺思春怨一类作品。诗体以五言为主,诗风清雅澹逸。《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云:“冶诗以五言擅长,如《寄校书七兄》诗,《送韩揆之江西》诗,《送阎二十六赴剡县》诗,置之大小历十子之中,不复可辨。其风格又远在薛涛上,未可以篇之少弃之矣。”其七古《从萧叔子听弹琴赋得三峡流泉歌》一诗,流美清雅,琴音之美,怀乡之情,融合无间。黄周星赞云:“似幽而实壮,颇无脂粉习气。”(《唐诗快》)其诗的艺术成就于此可见一斑。

另一女诗人薛涛,诗歌创作颇丰,北宋时尚有五卷五百首之多,可惜多散佚,今存不足百首。从其诗作中可以看出她与镇蜀的西川节度使韦皋、武元衡、高崇文、段文昌等有诗唱酬,与诗人王建、元稹、刘禹锡等也有唱和。薛涛诗除酬答赠送之作外,还有抒怀寄怨、托意婉讽的诗篇。其诗虽多五、七言绝句,但能于短小篇幅中表现出情思深杳,清丽秀雅的韵致。一些篇章历来评价颇高,如《罚赴边有怀上韦令公二首》,杨慎云:“有讽而不露,得诗人之妙。”(《升庵诗话》)《筹边楼》一诗,钟惺评云:“教戒诸将,何等心眼,洪度岂直女子哉,固一代之雄也。”(《名媛诗归》)又如《送友人》,《唐诗选脉会通评林》引徐用吾评云:“情景亦自浓艳,却绝无脂粉气。虽不能律以初、盛门径,然亦妓中翘楚也。”从这些评语中,可见出薛涛诗在中唐诗坛上独立成家,所以名重一时。

四

由唐敬宗宝历元年至唐哀帝天祐四年(825—907)为晚唐,是唐诗发展的第四个历史时期。这时

皇帝昏庸,宦官专权,党争激烈,藩镇割据,加以外患频仍,唐王朝已走上完全崩溃的末路。在这样历史背景下,前期以杜牧、李商隐、许浑、温庭筠等为代表的诗人,还受到中唐诗人的影响,希望朝廷中兴,希望以自己的才智报效国家。但朝政日非,内忧外患日益加剧,在这样的氛围中实难有所作为,于是诗人们转向对现实冷静的思考,对历史作深刻纵观,诗歌创作侧重于抒发个人情怀以及报国无门、回天无力的忧闷,同时也借怀古咏史一吐襟抱和表达深沉的感慨。

在晚唐前期的诗坛上,人号为“小杜”的杜牧,以其在诗歌创作上的独创性成为这一时期杰出代表之一。杜牧的诗歌虽仅存二百余篇,但众体兼备,内容丰富,诗篇有风调高华,流情感慨,豪俊健爽,轻倩秀丽的显著特色。杜牧是有经邦济世抱负的诗人,因官场险恶,仕途坎坷,壮志难酬,发而为诗,充溢着忧国伤时之情,像《感怀诗》、《河湟》、《早雁》、《郡斋独酌》、《东兵长句十韵》等等。目睹世事已不可为,且功业无成,失望苦闷,抑郁不欢,这种情怀在《齐安郡晚秋》、《齐安郡中偶题二首》、《登池州九峰楼寄张祜》等诗中表露得最为明显。有的诗则以对历史的沉思,超越时空,评价历史,使诗篇极有哲理性,这是杜牧诗歌中最精彩部分,如《赤壁》、《题桃花夫人庙》、《乌江亭》、《题木兰庙》、《题商山四皓庙》等等。还有一部分是寓情于景,借景抒怀的名作,如《泊秦淮》、《江南春》、《山行》、《登乐游原》、《九日齐山登高》等等。就是一些寄赠之作,也是婉转多情,风致悠然。就诗体而言,杜牧五言古诗笔力健举,开合自如;七言古诗甚少,仅《大雨行》可观。最为人所称赏者为律诗、绝句,被评为“情韵覃渊,足以方驾龙标,囊括温、李”(宋育仁《三唐诗品》)。晚唐诗风,气格卑弱,杜牧力矫时弊而颇自振拔,正如陈振孙所论:“牧才高,俊迈不羁,其诗豪而艳,有气概,非晚唐人所能及也。”(《直斋书录解题》)此论不为未见。

在晚唐前期的诗坛上,与杜牧、温庭筠齐名的李商隐,以对诗歌意境的新的开拓,对诗歌艺术表现的独特创造,和杜牧共同拓展了诗歌新天地,形成了唐诗发展的最后一个高峰。

李商隐是一个很有政治抱负,关心现实和国家命运的诗人,但又是一个仕途失意,沉于下僚,抑郁以终的不幸诗人。在现存的六百来首诗中,直接触及当时重大政治事件的约有六七十首。这些诗篇对朋党之争,宦官乱政,藩镇叛乱,外族侵扰等等,都有揭露和反映。少数篇章还直接描写了农村荒凉残破的景象,以及赋苛税繁和战乱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像被何焯赞为“可称‘诗史’”,当与少陵《北征》并传”(《义门读书记》)的《行次西郊作一百韵》、《灞岸》、《即日》等等。一些冠以《无题》或取篇中二字为题的诗篇,除少数几首外,大多题旨深曲,扑朔迷离,但又都情意委婉,摇曳多姿,虽难解而最耐讽玩。一些爱情诗,词藻华丽,靡艳绮妍,显然受南朝宫体诗及中唐艳情诗的影响。李商隐更多的诗作是感叹身世,摅写个人对仕途和现实生活中多方面的体验,但又表现得细腻深曲,幽微不明,旨在象外,创造了一种新的朦胧诗境。就诗篇的情感而言,其显著的特点是迷惘苦闷,沉郁感伤。就是一些咏物诗,也或明或隐地寄托着诗人的忧伤和感慨。李商隐的诗歌,艺术构思精密而又富于独创性,同时创造出朦胧深幽、迷离隐约之美,语言清丽妍华,近体诗格律精严,善于比兴,用典工巧,这些都是李商隐诗歌的显著特色。李商隐各种诗体均有佳作,但最能体现其艺术上创造性的是七律和七绝,前人多有好评,如姚培谦云:“其七言律体,瓣香少陵,独探秘钥,晚唐人罕有其敌。”(《李义山七律会意例言》)叶燮云:“李商隐七绝,寄托深而措词婉,实可空百代而无其匹也。”(《原诗》)这些评论不无溢美之处,但也确非泛泛之论。

与杜牧、张祜、殷尧藩等诗人交游并以诗唱和的许浑,在晚唐前期的诗坛上颇负盛名。韦庄《题许浑诗卷》云:“江南才子许浑诗,字字清新句句奇。十斛明珠量不尽,惠休虚作碧云词。”大中四年许浑居丁卯村时,曾自编其诗为《丁卯集》。今传《丁卯集》二卷(后人有所增补)全为近体诗,无一首古体,这说明许浑在晚唐诗坛上以专攻近体、最擅律诗而见长。田雯《古欢堂·杂著》云:“律诗之熟,无如许浑者。”此评对许浑而言,甚为精当。

许浑诗歌题材较为广泛。晚唐朝政昏暗,宦官专权,滥诛大臣,许浑有多首谴责宦官罪恶的诗篇,